



老子人本思想研究

田云刚 张元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老子人本思想研究

田云刚 张元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子人本思想研究/田云刚,张元洁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5

ISBN 7-5004-5040-0

I. 老… II. ①田… ②张… III. 老子—管理学—思想评论
IV. ①B223.15 ②C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9880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京南印刷厂 装 订 桃园兴华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375 插 页 2

字 数 29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哲学是指导人们处理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关系的最高层次的学问，中国传统哲学也是如此。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研究，都有着独特的贡献，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在当代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关系正被重新估量，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愈来愈追求以人为本。为了丰富和发展当代管理理论和法学理论，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有必要从中国传统哲学中汲取养分。在中国传统哲学的众多学派和思想家中，老子是道家文化的创始人，他的治国思想注重以人为本。研究老子的人本思想，对于推动现代企业管理、国家行政管理以及依法治国的人本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本书中，我们对老子思想的研究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第一，把老子思想看作是人本思想，从以人为本的观念出发构建了本书的逻辑体系并对老子的人本思想进行了语言释义；第二，把老子的人本思想同中国先秦时期其他思想家的相关思想进行对比分析，揭示了老子人本思想的比较特点；第三，采用辩证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揭示了老子人本思想的合理性与局限性；第四，对老子人本思想的现代价值进行揭示，从管理哲学和法哲学的高度上阐述了老子人本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和政府管理，尤其是对依法治国所具有的启示意义。由于老子思想具有理论的和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在探讨老子人本思想的现代价值时，结合当今

时代的特征和要求对其进行了合理改造，说明了它在现代企业管理、国家行政管理和依法治国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现实性及其启示意义。就此意义上来说，本书是一本管理哲学和法哲学著作，其中也涉及了历史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科技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教育哲学、心理学以及美学等方面的一些内容。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本书对引用的老子话语大都进行了今译。引语部分，主要参照了商务印书馆 2003 年出版的陈鼓应先生的《老子今注今译》，同时也参照了中华书局 1996 年出版的高明撰写的《帛书老子校注》，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出版的李先耕著的《老子今析》等著作。今译部分，则在参照上述著作的同时，也融入了我们自己的理解。本书从构思到完成写作经历了五年的时间，是我们长期从事哲学、管理学、法学等方面的教研工作并对老子思想进行不懈探究的结果，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已经发表。由于我们的学术水平有限，周围可资利用的文献资料较为缺乏，书中难免会有不足和错谬之处，欢迎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导 论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是我国春秋时期楚国人。作为我国道家文化的创始人，他在《道德经》（也称《老子》）一书中深入阐述了其以人为本来治理国家的思想。研究老子的人本思想，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从中提取合理要素为现今所用，以推动现代社会的人本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老子思想的产生及对后世的影响

1. 老子其人

有关老子的生平，史籍中记载最多的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约四百余字：“老子者，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

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老子，隐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除此之外，《礼记》、《庄子》、《列子》、《荀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关于老子生平事迹的片断记载。例如，《礼记》中记载：“曾子问曰：‘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之矣。当七庙五庙无虚主。虚主者，唯天子崩、诸侯薨与去其国，与祫祭于主，为无主耳。吾闻诸老聃曰：‘天子崩、诸侯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庙。君去其国，大宰取群庙之主以从，礼也。祫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主出庙入庙，必辟。’”^①《庄子》中也曾记载：“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②《吕氏春秋》中记载：“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子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臧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③《荀子》中也说：“老子有见于

① 《礼记·曾子问》。

② 《庄子·养生主》。

③ 《吕氏春秋·不二》。

拙，无见于信。”^①

根据这些典籍的记载，老子是春秋时期陈国人，今河南鹿邑县人。他早年曾在周朝王室担任图书管理员，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周王室发生内乱，便归居故里。随后，他到了鲁国，在那里生活了多年。老子晚年返回故里陈国居住。鲁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陈国被楚国灭掉，老子遭亡国之痛，逃往他国，最后死于秦国。老子在出入关秦途中，写下《道德经》五千言，阐述了他的自然无为、无私守柔、不争谦退以及贵虚反战的治国思想。老子思想对于先秦以及先秦之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 老子思想的产生

对于老子《道德经》的成书时间，学术界历来就有争议。梁启超认为《道德经》中用“王侯”、“王公”、“万乘之君”等字样共五处，用“取天下”字样共三处，这种成语不像春秋时的人所用。此外还有用“仁义”对举的好几处，这两个字连用是孟子所特有的。因此梁启超主张《道德经》作于战国末年。然而通过对比《周易》和《左传》不难看出，《易·蛊之上九》中讲“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易·坎彖》中讲“王公被险以守其国”，这两句中已有“王侯”和“王公”字样。至于“仁义”连用，则在《左传》中已经出现。《左传·庄公》中说：“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这里也已有“仁义”出现。因此，梁启超的《道德经》晚出说的论据是不能成立的。国学大师冯友兰也曾从文体上论证《道德经》晚出。他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认为《道德经》非问答体，因此应在《论语》和《孟子》之后。然而《周易》与

^① 《荀子·天论》。

《诗经》也非问答体，按此推论也当在《论语》和《孟子》之后，这就显得荒诞。且《论语》中的问答也非占据多数，与《道德经》一样有经体表述，因此冯友兰的《道德经》晚出说也不合理。而且，在先秦典籍中，从《管子》、《论语》、《墨子》、《战国策》、《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尹文子》、《列子》等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引述《道德经》，因此老子当早于孔子，《道德经》的成书年代不晚于战国初年。从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战国楚墓出土的《老子》摘抄本竹简来看，它的甲组本文义接近于《道德经》祖本，它的抄写年代距离老聃逝世可能仅有百年。从思想内容的一贯性等方面来看，《道德经》当是老聃一人所著。在《道德经》成书之后的较短历史时期内，老子思想就得到了广泛传播。作为先秦时期的智慧长者，他的思想对于先秦时期及其以后的其他思想家们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老子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丰富的理论渊源。从社会根源来看，春秋中叶是奴隶制经济向封建制经济迅速转型的时期。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时，由于冶炼技术发达，铁器广泛使用，牛耕得到了进一步推广，生产技术有了显著的改进，从而使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大批的自耕农，这从根本上推动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表现在经济上，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逐步代替了奴隶制的“井田制”。如公元前594年，鲁国的“初税亩”正式承认“私田”的合法性。齐、晋、楚、郑等国也先后采取了类似的措施。经济制度的剧烈转变，引起了政治上的剧烈动荡，奴隶和奴隶主之间以及新型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冲突，各诸侯国为了广土众民而彼此征战不已，僭越违礼、弑君杀父之事不断发生。司马迁描述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

社稷者不可胜数。”^①在这种“礼崩乐坏”的社会背景下，愈演愈烈的战争和沉重的赋税使劳动人民痛苦不堪，不甘心战死和饿死的人，常常起来为盗。对于这种现象，老子描述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②治国者推说人民难治，力图以加强刑罚来消除盗寇，镇压老百姓的反抗。为了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中国先秦的思想家们纷纷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和见解，从而揭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老子并不认为社会的动荡在于民的难治。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③为此，他在《道德经》中提出了“无为管理”的政治主张，提倡用“无为”、“守柔”、“简政”等方式来消除社会矛盾，使社会得以安定，使人民得以安康。老子的社会构想，是小农经济在老子思想上的反映，表达了农民的朴素愿望。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期，老子的治国主张和社会理想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老子思想的产生，不仅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也有丰富的理论渊源。老子作为周守藏室之史，无疑对春秋之前的典籍文献进行了广泛接触，并对其中的思想观点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从述古来看，在《道德经》的五千言中，述古之处并不少见，有的直接标明援引古人之言，有的援引古籍之语而未标明出处。标明直接援引古人之言的有第22、41、57、69、78等。援引古籍中之语而未标明出处的第5章和第79章源于《周易》，第64章本于《周书》，而第36章则出自《诗经》。因此，老子思想与《诗》、

①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道德经》第18章。

③ 《道德经》第75章。

《书》、《易》的思想有着渊源关系。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老子表述的关于阴阳对立、有无相生、物极必反、祸福相依、量的积累引起质变等辩证法思想主要源自于《周易》和《周书》。《周书》用五行学说解释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周易》用阳爻和阴爻组成的卦象表征了事物的对立统一。对于祸与福之间的关系，《周易》中的否卦和泰卦做出了最好的解释；而量的积累引起质变，则在《周易》的乾卦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这种客观辩证法被老子总结为自然规律，被称作“天之道”。对于“人之道”的表述，老子也借鉴了《诗经》、《周易》和《周书》。《诗经》中对劳动场面的描述、对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混乱和不公正想象的指责以及对社会动荡和大祸难即将发生流露出的痛心，启示老子关注国计民生。正如《诗经》中所说：“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①这和《周书·洪范》中的“五福”思想等一道被老子借鉴，并形成了“贵身”和民本等思想。同时，《周书》中以水为首的“五行”思想和主张刚柔相济的“三德”思想也被老子借鉴，从而形成了“上善若水”和“柔弱胜刚强”等思想，而《周易》中谦卦的“谦亨，君子有终”则被老子借鉴，形成了“谦退”和“不盈”思想，等等。这些思想被老子看作是“人之道”，被称为“德”。从语言形式上来说，老子在创作《道德经》时，借鉴了《诗经》的基本采用四言间或二至九言的句式，以及注重写实、讲求韵律、大量运用赋比兴和民间谣谚的语言形式和表现手法，这就使得写成的《道德经》成为一部语言凝练、具有诗歌韵味的哲学著作。老子虽然借鉴了前人的哲学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经》就是前人哲学观点的翻版或简单拼凑。他对西周以来的宗教迷信给予了强有力的批判，第一次

^① 《诗经·小雅·节南山之什》。

提出了具有本体论意义和客观实在性的“道”，并把“道”看作是自然规律；老子第一次把《周易》的六十四卦和《周书》的五行学说提炼成为“有无相生”和“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思想，并形成了“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量的积累引起质变的认识；老子第一次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和“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并从“谦”与“盈”、“柔”与“刚”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德治主张。由此看来，老子思想是老子在吸收了前代贤哲的思想资料和分析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对前人思想加以提炼、改造、发展所创建的思想体系。

3. 老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老子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老子的《道德经》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人对其进行注解和研究，甚至有些朝代的帝王也对《道德经》进行过注疏。例如先秦至六朝时期韩非的《解老》和《喻老》，河上公的《老子道德经》和《老子章句》以及王弼的《道德真经注》等；初唐至五代时期颜师古的《玄言新记名老部》和唐玄宗的《御注道德真经》等；两宋至五代时期吕祖谦的《音注道德真经》和范应元的《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等；明代明太祖的《御注道德真经》和彭好古的《道德经》等；清代姚鼐的《老子章义》和严复的《老子道德经评点》等；以及民国以来马叙伦的《老子校诂》、严灵峰的《老子章句新解》和高明的《帛书老子校注》等。这就使老子思想得以广泛而持续地传播开来，并对其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以及历代治国者治理国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思想文化的发展来看，老子开创了道家思想的先河，其身后的道家学者如关尹、列子、庄子等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虚静、无为、贵身等思想。据《吕氏春秋》载：“老聃贵柔，关

尹贲清，子列子贵虚。”^①又如庄子所言：“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的耶”^②、“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③。由此可见，老子、关尹、列子、庄子等人之间的思想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儒家思想虽与道家思想存在很大差异，但孔子向老子问礼使得儒家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老子是智慧的长者。老子思想经过稷下学派的传承，渐渐与儒家思想相融，并深刻地影响了儒家学派，儒家后学对他的“无为”、“和同”、“民本”等思想进行了吸收和转化，将“道”视为礼法，将“无为”视为遵循礼法而行事，要求治国者节欲、惠民、行仁义，不干扰百姓的生产和生活，以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正如儒家学者荀子所说：“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④荀子还说：“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⑤兵家学者则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思想中的辩证法思想以及“不争”等思想，正如孙子所说的“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⑥、“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⑦。这些都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

① 《吕氏春秋·不二》。

② 《庄子·山水》。

③ 《庄子·胠篋》。

④ 《荀子·君道》。

⑤ 同上。

⑥ 《孙子兵法·势》。

⑦ 《孙子兵法·谋攻》。

展。墨家则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不争”、“和同”、“反战”、“节欲”等思想，墨翟的“兼爱”、“非攻”是对老子“不争”和“反战”思想的继承，他的“尚同”思想是对老子“和同”思想的继承。墨子说：“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加。”^①这种节用思想是对老子节欲思想的继承。法家学者也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思想，正如《史记》所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两篇，号曰申子”^②；“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复归本于黄老。”^③慎到、申不害、韩非等法家学者以老子的“道论”为基础，把老子所说的“道”视作法，把老子说的“无为而治”看作是依法行事，即“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④，从而援老人入法。正如韩非所言：“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之，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之正。”^⑤中国古代著名的法学著作《管子》中也多见老子思想的痕迹。《管子》中讲道：“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也。使民于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⑥这句话的意思几同于老子的“不争”；《管子》中又讲道：“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天下者，天地之配也。道往者其人莫来，到来

① 《墨子·节用上》。

②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③ 同上。

④ 《慎子·君人》。

⑤ 《韩非子·主道》。

⑥ 《管子·牧民》。

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设，身之化也。”^①这段话几同于老子的“道论”；《管子》中还讲到：“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贵而不过度，则臣道也。”^②这段话是对老子“无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因为如此，《汉书·艺文志》把《管子》列入道家，而《隋书·经籍志》则把它列入法家。除此之外，阴阳家、名家、纵横家、农家等也从不同角度汲取了老子的某些思想，就连后世的中国佛家哲学也以老子创立的道家文化为重要源头。魏晋南北朝开始，儒释道三家合流，其后中国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医学、文学、语言学、宗教学等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以老子为主要代表的道家思想在汉初、魏晋以及唐朝等时期备受尊崇，对于汉初的文景之治和唐初的贞观之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汉代董仲舒提出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中国历代治国者往往内用黄老或佛老，外用儒法。老子提供的民本、无为、守柔、简政、节欲、息兵、息诉等治国方略，一方面对治国者进行国家治理提出了警醒，另一方面又成为治国者的管理理念和治国方式，尤其是在朝代更迭或战乱之后，治国者往往采用老子提供的无为而治和简政息兵的治国方式，来恢复社会生产，使百姓休养生息，这对于缓和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保证国泰民安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处理人与人之间乃至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时，统治者也往往会采用老子提倡的“不争”与“合和”思想，化解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老子的“无为”、“谦退”以及“贵身”思想常被当作臣子或士子们处理与帝王之

① 《管子·形势》。

② 《管子·乘马》。

间关系的重要指南，当不被重用或言论不被采纳时，他们往往会选择隐忍或隐退以保全自身的生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社会矛盾。在提高管理水平和民众素质方面，老子的“圣人治”为统治者提出明确的目标，能否成为“圣王”、“明君”成为统治者自身评判以及臣民对其进行评判的标准。为此，老子提出的“尊道贵德”思想和儒家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等一道成为统治者加强自身修养，提高管理水平的重要指针。统治者也会用这种修身思想要求臣民，以此来提高民众的素质。在社会处理变革的问题上，老子的“有无相生”和“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思想为统治者处理社会制度变革问题提供了方法论依据，或进行变革或遵循古制，他们都可依据老子思想做出不同的选择。

老子思想在中国本土不断传承的过程中，也逐步地走向世界，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思想。早在 1350 多年前，老子的《道德经》就被唐代高僧玄奘和道士成玄英等译成梵文。近代以来，《道德经》是西方学者翻译最多的外国典籍之一。至公元 18 世纪，西方一些国家就有了《道德经》的多种文字的译本。清道光三年（1823）法国著名汉学家莱墨萨德的法文译本《老子》问世；道光二十二年（1842），法国著名汉学家宙兰出版了一本比较完善的《老子》法文译本；1872 年前后，德国汉学家施特劳斯译有《老子》德文本，英国汉学家李雅格译有《老子》英文本；1893 年俄罗斯著名作家列·托尔斯泰与波波夫合译了德文本的《老子》。目前，老子的《道德经》已成为译成外国文字种类最多、发行量最大的世界文化名著之一。老子《道德经》在国外的广泛发行，引起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对世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莱墨萨德的法文译本《老子》的问世，引起了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重视，于是在其名著《哲学史讲演录》中评述了老子的著作。1910 年托尔斯

泰在其出版的《中国哲人老子语录》中，撰写了《论老子学说的真髓》一文，声称老子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德国哲学家尼采曾评论《老子》一书说：“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对老子思想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例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就曾在《国情咨文》中引用老子的话说“治大国，若烹小鲜”^①，以此作为他的治国方略之一。西方的许多科学家也认为老子及其他东方思想家的许多学说和观点，与现代科学理论不无相通之处，并把自己的科学发现归功于老子及其他东方哲人的启迪。例如，英国科学哲学家 J. D. 贝尔纳就曾在 1965 年召开的第 11 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和 A. L. 麦凯一起引用了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以此来说明科学学的定义问题。他们还把《道德经》称之为“描述中国人对自然与社会运动看法的中国古典优秀著作”。^②西方的许多企业家和管理学家也十分重视从管理学或经营学的角度对老子思想进行探讨，从中获取管理智慧或人生启迪。例如，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圣吉就一直致力于将东方古老智慧的结晶和最新的管理科学融合，他尤为推崇老子的领导哲学，在其名著《第五项修炼》一书中提出了“无为而为的有机管理”^③。就此看来，老子思想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代表性的；它也不是仅属于中国的，而是属于世界的。它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乃至当今世界都有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① 《道德经》第 60 章。

② [英] J. D. 贝尔纳著，陈体芳译：《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3 页。

③ [美] 彼得·圣吉著，郭进隆译：《第五项修炼》，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332 页。